

主編 蘇用發 執行主編 管成學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編蘇氏總族譜

(第貳冊)

學術著作篇
研究考證篇

蘇步青



主編 蘇用發 執行主編 管成學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編蘇氏總族譜

(第貳冊)

學術著作篇
研究考證篇

蘇步青

主編 蘇用發

執行主編

管成學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編蘇氏總族譜

蘇步青

(第貳冊)

學術著作篇
研究考證篇

三 學術著作篇

《蘇子》

蘇秦（約前340—前284）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班固自注：“名秦，有列傳。”這里所說的“列傳”就是《史記·蘇秦列傳》。可見“《蘇子》三十一篇”，應是戰國縱橫家蘇秦的著作。但是，這部古書早已亡佚。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這是學術界尚未澄清的重要問題。本文謹就《蘇子》的內容及其重要價值，略作考述。

一、《蘇子》內容和編撰

戰國之世，諸侯稱霸，列國紛爭，兵革不休，民不聊生。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的縱橫家就是通過合縱連橫活動，以求達到匡濟亂世、救傾扶危、擇交安民的思想學派。所謂“合縱”就是“合衆弱以攻一強”，所謂“連橫”就是“事一強以攻衆弱”¹。劉向《戰國策書錄》說：“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可見戰國時期的“從橫長短之說”乃是一門深受諸侯各國普遍歡迎的“顯學”。

蘇秦是東周洛陽人，年輕時曾師從鬼谷子，學習縱橫之術。《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史記·張儀列傳》說：“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鬼谷子是戰國中期的著名隱士，蘇秦、張儀都是他的學生。據《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為縱約長，并相六國”，以抑強秦。然而，司馬遷依據后人擬托的長篇遊說辭，認為蘇秦是與張儀同時的敵對人物，致使后世對蘇秦的真實面目認識不清。

值得慶幸的是，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里²，保存有大量已經散佚的蘇氏遊說資料。在全書二十七章中，有關蘇氏的資料多到十六章。其中十四章是“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蘇秦書信和遊說辭。這些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

1 《韓非子·五蠹》。

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戰國縱橫家書》，文物出版社1976版。

提供了一個鑒別蘇秦資料真偽的標準尺度，使我們能夠去偽存真”¹，從而看清蘇秦的真實面目。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里蘇秦書信和遊說辭的來源。唐蘭先生說：帛書中“關於蘇秦的書信和談話”，應是“真正的《蘇秦書》”。還說：“劉向編的《戰國策》里所保存的，有一些也應是《蘇秦書》的殘篇。”²楊寬先生則認為：這些“原始的蘇秦資料，可能出于一部原始的《蘇子》”³。

必須指出的是，先秦諸子大多都是同一學派的集體著作。如《管子》、《墨子》、《莊子》、《商君書》諸書，就是管仲、墨翟、莊周和商鞅及其學派的集體作品。清儒沈欽韓說：“今見于《史記》、《國策》，灼然為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后，蘇代、蘇厲等并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為蘇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厲併入。”錢穆說：“余疑《漢志·蘇子》三十一篇，當如沈氏所說，即今傳《史記》、《國策》所載蘇氏兄弟之辭。”⁴可見《蘇子》一書的內容，應包括蘇秦、蘇代、蘇厲及其門人、弟子和后學的著作。也就是說，《蘇子》是蘇秦及其學派集體著作的總集。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有十七章原始的蘇秦資料，內在聯系極為密切。這些原始蘇秦資料的發現，使我們能夠相互參照，考訂出各篇的作者和年代。特別是能夠考訂出哪些是蘇秦的，哪些是蘇代、蘇厲的，哪些是蘇氏后學的作品，從而使那些散見在各書里真實而零星的史料，都可以串聯起來了。這樣，我們不但可以澄清蘇秦的真實面目，而且可以把《蘇子》的佚篇匯輯起來。

二、《蘇子》篇章的類別

蘇氏兄弟及其學派的書信和遊說辭，大都保存在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戰國策》和《史記》里。這些資料的內容，有的比較原始，有的經后人加工整理，有的則是蘇秦后學以蘇秦名義擬作的。我們共輯得《蘇子》佚文七十余篇，依其內容的真實程度，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蘇氏兄弟的原始資料。

“蘇氏兄弟”是指蘇秦、蘇代和蘇厲兄弟三人，當以蘇秦為代表。他們都是“名顯諸侯”的縱橫家，活動年代也大體相同。所謂“原始資料”，就是未經后人加工整理的

¹ 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² 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³ 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⁴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309、310頁，中華書局1985版。

蘇氏兄弟的書信和遊說辭。例如：

- (1)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一“自趙獻書燕王”章
- (2)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二“使韓山獻書燕王”章
- (3)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三“使盛慶獻書燕王”章
- (4)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四“自齊獻書于燕王”章
- (5)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五“謂燕王”章
- (6)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六“自梁獻書于燕王（一）”章
- (7)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七“自梁獻書于燕王（二）”章
- (8) 《東周策》“謂薛公”章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收錄的蘇秦資料都比較原始”，而前十四章中屬於蘇秦的十三章，都沒有遊說者的署名，可能就是輯于原始“《蘇子》的緣故”¹。這些篇章的共同特徵，就是章首均直書“謂某某曰”，沒有記載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遊說者的名字。若再仔細閱讀全文，就會有質樸、簡練、委宛而有條理的感覺。可見這類蘇氏兄弟的作品，從行文款式到文章內容，都保持了作品的原始面貌。

第二類：經后人加工整理的蘇氏資料。

這是指在傳抄或編輯成冊時，經過后人加工整理和修飾的蘇氏兄弟的書信和遊說辭。例如：

- (1)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二二“謂陳軫”章
- (2) 《東周策》“昭獻在陽翟”章
- (3) 《西周策》“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章
- (4) 《燕策三》“孟嘗君將入秦”章
- (5) 《西周策二》“雍氏之役”章
- (6) 《齊策四》“蘇秦之燕至齊”章
- (7) 《燕策二》“蘇代〔秦〕自齊使人謂燕昭王”章

這類書信和遊說辭的共同特徵，是篇首增加了故事發生的具體背景，大都寫清遊說者的姓名，文章的內容顯得“繁復，文字也要長得多，當是出于后人的加工修改和擴大”的緣故²。這些篇章不僅增添了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遊說者的姓名，而且通篇行文多增置“夫”、“而”、“則”等虛詞，文章詞句常有增減、改動和修飾，使全文顯得

1 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2 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語言酣暢、朗朗可讀。這些顯然都是經過后人加工整理的結果。

第三類：蘇秦后學擬作的蘇氏資料。

這是指戰國末年縱橫家中的蘇秦后學，為了給初學者提供練習遊說的腳本，擬托蘇秦名義擬作的書信和遊說辭。例如：

- (1) 《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章
- (2) 《燕策一》“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章
- (3) 《趙策二》“蘇秦從燕至趙始合縱”章
- (4) 《楚策一》“蘇秦為趙合縱說楚威王”章
- (5) 《魏策一》“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章

這些書信和遊說辭包括著名的“蘇秦合縱八篇”，都是戰國末年蘇秦后學的作品。這就是《史記·蘇秦列傳》所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這類作品的“氣勢都很盛，跟真正的蘇秦文筆，宛轉而有條理，風格截然不同”¹，篇中描述多具有濃厚的文學誇張色彩。但它所反映的豐富資訊，則是我們研究戰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

三、結語

《蘇子》佚文的搜集、考定、整理及其編輯成書，對研究蘇秦及其學派的真實事迹、戰國縱橫家以及戰國時期的歷史諸問題，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蘇秦及其學派的書信和遊說辭，既是《蘇子》的主要內容，也是蘇秦學派的智慧結晶。我們通過細緻的整理和研究，把蘇秦、蘇代、蘇厲兄弟各自的書信和遊說辭區分開來，逐章進行考訂、梳理和編年，進而澄清蘇秦的家世、師傳和蘇氏兄弟的生平事迹。以圖還原蘇秦的本來面目，從而正確評價蘇秦在縱橫家里的重要地位及其歷史貢獻。因此，這些《蘇子》佚文自然成為學者們研究蘇秦及其學派時，最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蘇秦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漢書·主父偃傳》載：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集注》引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蘇子》佚文的篇章衆多，豐富內容，也就成為研究縱橫家思想學說的珍貴資料。《鹽鐵論·褒賢》說：“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禮卑辭，重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因此，蘇秦、張儀所代表的縱橫家，大都是戰國時期叱吒風雲的重要人物。他們那些鮮活、生動的人生畫卷，正是研究戰國歷史的珍貴資料。而《蘇子》佚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將為戰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一部真實可信的珍貴史料。

我們之所以花費多年精力來搜集、整理《蘇子》佚篇，就是要力求還原蘇秦及其

¹ 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戰國縱橫家書》附錄，文物出版社1976版。

學派的本來面目，從而正確評價縱橫家的歷史功績。誠如司馬遷所說：“毋令獨蒙惡聲焉。”

（蔡運章）

蘇竟秘閣校書

蘇竟（前40—前30），字伯況，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

漢平帝時，蘇竟因精通《易經》，入朝廷為博士、講書、祭酒。

蘇竟善圖緯，通百家之學。

王莽時，蘇竟曾與劉歆負責校書。

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漢朝建立之初，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國家藏書極缺，所以漢廷下令搜求散落民間的圖書，廣開獻書之路，還設寫書官抄寫書籍。百年之間，朝廷書積如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

漢成帝時，曾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多年的搜集工作，極大地豐富了政府的藏書。為了整理浩如煙海的書籍，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劉氏父子奉命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校書事業。

此次校書工作由國家組織人力，劉氏父子負其總責，延請各方面的專家分工合作。劉氏父子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校后再由劉向、劉歆審訂，并撰寫各書的敘錄。劉向依此編寫了《別錄》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提要目錄專著，為目錄提要之祖。

劉氏父子二人共同工作了十九年。劉向死后，劉歆繼承父業，寫出《七略》，包括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這是劉歆依據各種書籍的不同內容，按其學術性質劃分的。還有一略即輯略，實際上是全書的緒論，闡述了全部目錄的大略及各類書籍的學術思想源流，置于全書之首。

《七略》總共著錄圖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書目大都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

《七略》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綜合性圖書分類目錄，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圖書分類體系，比被稱為“目錄學之父”的瑞士蓋士納所編的《萬象圖書分類法》早一千五百五十余年。

《別錄》和《七略》的出現，第一次建立了我國目錄學的方法和理論，為此后整個封建社會目錄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漢代到清末，劉氏父子創建的目錄學體系一直被奉為正統目錄學的圭臬，受到歷代學者的推崇。劉氏父子的校書事業是中國文化

史上的首創之舉，篳路藍縷之功不可磨滅。

蘇竟身逢盛世，有幸校書，并與劉歆聯手，其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蘇竟后拜代郡中尉。當時，匈奴經常犯邊，燒殺淫掠，由于蘇竟整軍經武，代郡獨得保全。

光武帝即位后，拜蘇竟為代郡太守。

建武五年（29），蘇竟病篤回京，拜為侍中。

數月后，蘇竟因病免官，卒于家中，享年七十。

當初，護軍鄧仲況擁兵自重，占據南陽屬縣為盜，劉歆兄子劉龔為其謀主。蘇竟給劉龔和鄧仲況寫信，曉以大義，二人遂降。

蘇竟從不自誇其功，只是潛心道術，曾作《記梅篇》等文章傳于后世。

（《後漢書》卷六十上等）（于元）

《陳留耆舊傳》

《陳留耆舊傳》，魏蘇林撰。

《陳留耆舊傳》是我國第一部記載一郡先賢嘉言懿行的專書。劉知幾《史通·雜述篇》提到了四部此類郡書，《陳留耆舊傳》位列四部書之首。

《陳留耆舊傳》是《後漢書》取材來源之一。

《隋志》、《唐志》均著錄此書，后佚。此書的前人輯本有二，一為元代陶宗儀《說郛》輯本，僅輯出七事；一為清代王仁俊《經籍佚文》輯本，僅輯出一事。陶、王二氏之輯本，合計僅八事。其中尚有誤收者。

河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呂友仁輯佚此書時，輯得二十七事，涉及十六人，勒為一卷。

（《陳留耆舊傳》等）（于元）

《封禪國山碑》

《封禪國山碑》，蘇建作。

蘇建是三國時期吳國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

蘇建是著名書法家，曾寫《封禪國山碑》傳世。

魏文帝曹丕黃初三年、昭烈帝劉備章武二年（222），孫權見曹丕和劉備已經分別建國了，自己便也稱王，定都建業，建立吳國，史稱孫權為吳大帝。

孫權統治時，江東經濟有顯著發展。北人南來，山越出居平地，勞動力增多。經濟

的發展促進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出現了一批知名文士，如虞翻、陸續、韋昭。蘇建是與他們同時代的書法家。他與蘇武的父親蘇建重名了。

吳主孫皓元璽元年（276），陽羨（今宜興）發生地震，離墨山突然出現十丈長的石室，地方官立即將此事上報給吳主孫皓。

孫皓是吳國的第四代君主，初立時，撫恤百姓，開倉濟貧，減少宮女，放生珍禽異獸，一時被譽為令主。但他很快便原形畢露，變得粗暴好殺，沉湎酒色了。他曾遷都至武昌（今鄂州），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孫皓接到報告，認為石室的出現是件祥瑞之事，便封離墨山為“國山”，遣司徒董朝到陽羨舉行封禪大典，并刻石立碑為記，這便是“封禪國山碑”。

國山碑至今尚在，在宜興市張渚鎮善卷洞西南國山頂上。國山原名離墨山。國山碑呈橢圓形，上端略銳，形如圜，故又稱“圜碑”，也稱“董碑”。碑高二米三五，碑四周環刻文字，共四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篆書，為吳國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記載了當時吳國境內發生的三件奇異現象：一是“湖澤門通”，指臨平湖（在今浙江省余杭縣）自漢末草穢壅塞，吳時突然開通；二是“石室印封啓九州吉”，指鄱陽郡歷陽（今安徽省和縣）山石上的紋理顯現為“楚九州者，吳九州郡，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三是“石室山石闕”，即陽羨離墨山開裂，出現十余丈的石室。其中有關江南地區地震現象的記錄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歷史資料。

《封禪國山碑》，篆書，三國·吳天璽元年（276）立，四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碑在江蘇宜興。《集古錄》云：“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碑文紀吳得祥瑞，封禪于國山之事。據《宜興志》載，國山本名離墨山，以孫吳時大司徒董朝封于此，故又名董山。山在宜興縣張渚鎮北十里，碑即立于山頂之上。宋趙彥衛《云麓漫鈔》謂：鄉人又俗呼此碑為“圜碑”，“以其石圓八出形如米廩云”。

《封禪國山碑》為三國時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來，多見著錄。其書淳古秀茂，體勢雄健，筆多圓轉，繼承了周秦篆書的遺意，與方折突出的吳《天發神讖碑》相異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稱其“渾勁無倫”。楊守敬《平碑記》云：“秦漢篆書，自《琅玕臺》、《嵩山石闕》數碑而外，罕有存者，惟此碑巍然無恙，雖漫漶之余，尚存數百字。玩其筆法，即未必追蹤秦相，亦斷非后代所及。”

（《宜興文博網》等）（于元）

蘇愬與《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得以流傳，蘇愬是有功的。

劉歆是劉向的兒子，為人聰明好學，家學淵源。漢元帝見他精通《詩》、《書》，文章也寫得好，便拜他為黃門郎。

劉向進石渠閣整理皇家藏書時，劉歆也受詔進閣，協助父親校書。

劉歆進閣后，工作十分認真和勤奮。一天，他在書堆中發現了一本用古文寫的《春秋左氏傳》。原來，秦始皇焚書時，先秦儒家經典都被焚毀了。漢朝初年，一些儒者通過回憶，用口頭將儒家經典背了出來，重新記錄成書。後來，漢朝諸侯王魯恭王為了修建王宮，拆了孔子舊宅，在牆壁中發現了《尚書》、《逸禮》、《論語》、《孝經》等儒家經書。這樣，世上便有了兩套儒家經書。

漢朝初年一些儒家學者憑記憶整理出來的儒家經書因是用漢朝通用的文字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經》；而孔宅牆壁中的儒家經書因是用先秦通用的文字篆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經》。傳授古文經學說的，稱為“古文經學”；漢儒對《今文經》的解釋稱為“今文經學”。

劉歆發現《春秋左氏傳》后，通過研究，發現作者左丘明對事件的褒貶和孔子一樣。他認為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時代人，親眼見過孔子；而《公羊春秋》的作者公羊高和《谷梁春秋》的作者谷梁赤比孔子晚生七十多年，所記之事都是得自傳聞，記載的詳略自然不同。後來，在整理藏書過程中，劉歆又發現了用古文字寫的《尚書》、《逸禮》、《毛詩》等書。劉歆仔細一讀，發現它們都比《今文經》準確。

漢哀帝即位后，劉歆深受寵信，被任命為光祿大夫。于是，劉歆向漢哀帝反映了這個情況。他說：“陛下，應將《古文經》列入學官，這些才是真本。”漢哀帝下詔，讓劉歆和《五經》博士討論《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優劣。不料，這些老學究抱殘守缺，頑固不化，竟然拒絕討論，抵制真本。劉歆越想越氣，寫了一篇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指責那些只想做官，不重實學的《五經》博士們。他在文中說：“你們不承認《古文經》，竟然拒絕它們，讓它們泯滅失傳，這是專己守殘，有失聖意的。”

一些大儒聽說后，對劉歆群起而攻之。這些靠《今文經》做官的官迷們紛紛指責劉歆，說他亂改舊章，大逆不道。

最后，漢哀帝也保護不了劉歆，《古文經》不但沒有被承認，劉歆還不得不離開京城。

蘇愬，字休預，是蘇則之子，世襲父爵。

魏元帝咸熙（264—265）年間，蘇愬曾任尚書。在西晉時曾任太常、光祿大夫。

蘇愬的兒子蘇紹是詩人，在西晉有一定的名氣。從《晉書》中可知，蘇愬還任過涼州刺史。

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蘇愬曾與河西鮮卑大戰，后退守內地。

西晉惠帝時，朝政腐敗，爆發了八王之亂。永興元年（304），匈奴貴族劉淵趁西晉內部狗咬狗之際，起兵于離石（在今山西），建國號為漢。

晋懷帝永嘉四年（310），劉淵病死，其子劉聰繼立。次年，劉聰遣大將石勒殲滅晉軍十余萬于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鹿邑），并俘殺太尉王衍等人。劉聰又遣大將劉曜攻破西晉都城洛陽，俘晉懷帝，殺官兵百姓三萬余人，史稱“永嘉之亂”。

這次大亂之後，中原大量人口為避戰火，紛紛遷往長江中下游一帶，史稱“衣冠南渡”。大量僑州僑郡的設立，為東晉偏安一隅作了準備，深刻影響了東晉的政治面貌。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長江中下游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古代經濟中心進一步遷往南方。

永嘉之亂時，洛陽淪陷，典籍蕩然，文化遭到了一次滅頂之災。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說：“永嘉喪亂，衆家之書并亡。”歷代相傳的歷史文獻在大亂中多有失傳。

可喜的是，到東晉時，《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又面世了。孔穎達《尚書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說皇甫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又引《晉書》說：“晉太保公鄭衝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洪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彥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寧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輿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又孔穎達《尚書正義·序》說：“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后傳授乃可詳焉。”

據以上資料可知，《古文尚書》由鄭衝傳授下來，傳授系統非常明確。蘇愉在這次文化傳承中是立有大功的。

後來，有人懷疑此書為偽書。經近代專家學者考訂，其書多古語，最晚也是東漢以前的，且多被引用，其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九家舊晉書》）（于元）

《蘇子》

據《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舊新唐志皆七卷，宋不著錄，蓋唐末復亡，群書多引用其文。

蘇彥，東晉孝武帝時人，為北中郎參軍。

蘇彥為人博學多才，能言善辯。

蘇彥著有《蘇子》七卷，文集十卷。

蘇彥尚有詩二首、短賦三首、詩序一篇傳世：

《西陵觀濤詩》

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訇隱振宇宙，瀨磕津云連。

《七月七日詠織女詩》

織女思北沚，牽牛歎南陽。時來嘉慶集，整駕巾玉箱。瓊珮垂藻蕤，霧裾結云裳。
釋轡紫微庭，解衿碧琳堂。歡宴未及究，晨暉照扶桑。悵悵一宵促，遲遲別日長。

《芙渠賦》

偉芙蓉之菡萏，耀煥燁之丹花。舒紅彩于綠沼，留映的于朱霞。

《浮萍賦》

余嘗泛舟遊觀，鼓楫川湖。睹浮萍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拘。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秋夜長》

晨暉電流以西逝，閑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佇，列宿雙景以相望。輕雲飄霏以籠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時禽鳴于庭柳，節蟲吟于戶堂。零葉紛其交萃，落英颯以散芳。睹遷化之遁邁，悲榮枯之靡常。貞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翹以凌霜。

《鵝詩序》

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云野人所致，外吏規為方便，以俟送客，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雁，若其無音，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舊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七）（于元）

《宋書》

《宋書》一百卷，其中元嘉名臣諸傳皆為蘇寶所撰。

蘇寶，字寶生，出身寒門，有文才。

南朝宋文帝元嘉（424—453）年間，成立國子學，聘蘇寶為毛詩助教，為宋文帝所倚重。

國子學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

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始設國子學，與太學並立。南北朝時，或設國子學，或設太學，或兩者同設。北齊改名國子寺。隋文帝時以國子寺總轄國子、太學、四門等學。隋煬帝時改國子寺為國子監。唐宋亦以國子監總轄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亦分別稱國子監。明清僅設國子監，為教育管理機關，兼具國子學性質。光緒三十一年（1905）設學部，國子監遂廢。國子學（國子寺、國子監）與太學名稱雖異，歷代制度亦有變化，但俱為最高學府。惟當兩者並設時，國子學之教育對象為更高階層統治者之子弟。

助教為古代學官名，即教師，西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設置，協助國子博士教授生徒。南北朝、隋代相沿設置，唐代國子學、太學、廣文館、四門學等都設有助教。

明清兩代，僅有國子監助教。

蘇寶精通詩經，因而出任助教一職。後來，蘇寶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蘇寶奉敕繼何承天、裴松之撰寫有宋一代國史，元嘉名臣諸傳皆為蘇寶所撰。

沈約，字休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先後在宋、齊、梁三朝做官，舊史一般稱他是梁朝人。齊武帝永明五年（487），沈約奉詔修《宋書》，一年完成。《宋書》一百卷，是南北朝劉宋一朝的國史。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科學家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只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後來，便是蘇寶等人續寫宋史了。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負責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間。所有這些都為沈約撰寫《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因此說，二十四史中的《宋書》里，也有蘇寶等人的功勞和心血。

但文人多舛，蘇寶的命運是不幸的。當時，南彭城蕃縣人高闔、沙門釋曇標、道方等人妖言惑眾，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之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共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人起兵攻宮門。事發之後，死者數十人。蘇寶也受到牽連，竟以“知高闔謀反，不即聞啓”的罪名，與高闔同時伏誅。

（《宋書》卷七十五、《南史》卷二十一）（于元）

《元包經傳》

自《六經》焚于秦而復出于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始興。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其說不勝其繁。

元嵩，俗姓衛，河東人，南北朝梁末出家，居成都野安寺。北周平蜀，元嵩入關，師事宿儒，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元嵩上書，賜爵蜀郡公。

后元嵩廢佛還俗，著《元包數》五卷，為《歸藏》著，用三十六策，以三為揲，以飛伏、世應、渾天、納甲、五行生克占吉凶，用十二支、十干為千有二百兆。

易理深奧難通，唐時蘇源明特為之作解，即《元包經傳》。

此書見于《叢書集成初編》哲學類，現藏吉林大學圖書館。

此書另一版本《元包五卷》見于《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現藏國家圖書館；另一版本《易包》見于《僅學堂叢書》，現藏首都圖書館。

（《元包經傳》、《元包五卷》、《易包》）（于元）

《寶藏論》

《寶藏論》，蘇元朗撰。

據《宋史·藝文志》著錄：“《寶藏論》一卷、《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丹臺新錄》一卷，青霞子撰。”

蘇元朗曾居青霞谷修煉，自號“青霞子”。

蘇元朗曾作《太清石壁記》及《茅君歌》，又發明太易丹道，著《寶藏論》。

蘇元朗生于西晉武帝太康（280—289）年間，于隋文帝開皇（581—600）年間到羅浮山居住，時年已達三百余歲了。

有一天，弟子聽說朱真人服靈芝成仙了，便爭著議論起來：“靈芝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惟有黃芝獨產于嵩山，又高又遠，杳不可得。”蘇元朗笑道：“靈芝在汝心中，何必向外求之？諺語說：‘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求之，產成至寶。’此之謂也。”為此，蘇元朗乃著《旨道篇》給弟子們看。自此，道徒始知有內丹了。

蘇元朗見《古龍虎經》、《周易參同契》、《金碧潛通秘訣》三書文繁義隱，學者難通，便著《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論述神丹要在自身内心中修煉。文中說：“天地之大，聖人象之。精華在乎日月，進退運乎水火，是故性命雙修，內外一道，龍虎寶鼎即身心也。身為爐鼎，心為神室，津為華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鉛。陰中有陽，是為嬰兒，即身中坎也。八石之中，惟用砂汞，陽中有陰，是為姹女，即身中離也。鉛結金體乃能生汞之白，汞受金炁然后審砂之方。中央戊己是為黃婆，即心中意也。火之居木，水之處金，皆本心神。脾土猶黃芽也，修治內外，兩弦均平，惟存乎真土之動靜而已。真土者藥物之主，斗柄者火候之樞，白虎者鉛中之精華，青龍者砂中之元氣。鵲橋河車，百刻上運；華池神水，四時逆流。有物之時，無為為本，自形中之神入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猶金歸性初而稱還丹也。”

蘇元朗內視九年，修道成功。

內丹之稱始于蘇元朗，葛洪的金丹也因此被稱為外丹。由冶煉汞砂藥物發展到修煉自身，這是道教史上的一次突變。雖然內丹理論遠早于此，但蘇元朗首次明確提出并主張“內外兼修”，而以內為主，使內丹理論漸趨完善。蘇元朗對道教發展的貢獻不言自明。

蘇元朗在《茅君歌》中說：“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寒暑相反，虎哺龍吟，青黑赤白，各居一方，不得參差，乃失紀綱，陽卻作臣，陰乃為王，消息在意，天道乃昌。”又說：“還中亦無丹，丹中復有還，無鉛不成丹，還丹生在鉛。”又說：“白雪粉，黃金芽，不得妙，莫謾誇，時人不識真黃芽，唯知盡認鉛黃花，花木是死物，焉得到仙

家？”

（《羅浮山志》）（于元）

《璿璣圖詩》

《璿璣圖詩》，蘇惠作。

蘇惠字若蘭，始平（今陝西興平）人。父親蘇道賢，擔任過陳留縣令。蘇惠是蘇道賢的第三個女兒。她從小聰明伶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魏晉時代，剛從漢代儒學獨尊的思想禁錮狀態中解放出來，各種思想異常活躍，社會風氣比較開放。

蘇惠生于北方，特別是生活在苻秦統治下的多民族融合的社會里，女性禁錮很松，因此蘇惠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和才能。

蘇道賢是一位比較開明的家長，前秦皇帝苻堅興儒重教，因此蘇道賢延請名師在家設帳教三個女兒讀書。三個女兒中，數蘇惠秀外慧中，勤勉好學。十五歲時，蘇惠已經通經史，善詩歌，寫得一手娟秀的墨筆字，文筆非常流暢。

蘇惠十六歲那年嫁給了竇滔。竇滔字連波，是苻堅右將軍竇于真的孫子，竇朗的第二個兒子。

竇滔從小入太學讀書，博通經史，每次考試總是獨占鰲頭。苻堅蒞臨太學視察時，曾親自策試過他，對他非常讚賞。

苻堅既崇文，又尚武，太學生也兼學武功。竇滔受過全面教育，能文能武，加上長相俊美，一時間成為同輩人中的佼佼者，享有很高的聲譽。

竇滔二十歲舉行冠禮后，苻堅第一個把他提拔出來做官。就在這一年，他與蘇惠成親了。兩人才貌相當，志氣相投，格外恩愛。

竇滔深受苻堅賞識，開始任京官，漸至要職。後來，苻堅滅了前燕和涼，急需大批官吏去管理新占領的地區，因此竇滔被放外任。蘇惠身體不好，不耐顛簸，只得暫留京中。

竇滔先任并州刺史，很有政績，後又調任秦州刺史。

在秦州任上，竇滔娶了一個鮮卑女子趙陽臺為妾。趙陽臺長得白皙嬌美，能歌善舞，竇滔完全陷入再婚的喜悅中。蘇惠得知丈夫喜新厭舊，心里十分痛苦。

竇滔在秦州任上沉湎酒色，荒于政事。有一次，朝廷徵集糧草，竇滔沒有按期交納，貽誤了軍機。苻堅大怒，罷免了他的職務，流放到敦煌去戍守。

趙陽臺見竇滔被罷了官，便跟他大吵大鬧。竇滔只得把她打發走，獨自一人跋涉流沙。